

## 客观理性看待当前经济运行八对关系

彭磊

**内容提要** 2024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得到巩固和增强,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多,动能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改善,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但经济回升势头未达到广大群众的预期,社会上出现思想迟疑摇摆、信心灰心气短、行动踟蹰不前等现象。本文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立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和方法,对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八对重要关系进行了重点探讨,以达到解疑释惑的目的。这八对关系中,或是老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或是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需要重新审视。比如,文章着重指出,在当前经济暂时出现困难情况下,要坚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就是强调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动摇,思想上坚定统一的重要性。再如,文章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探讨中,着重突出了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强调构建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收体系的重要性。此外,文章针对新质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等新概念的出现也给予矛盾主要方面的初步探讨,强调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桥接、“人民至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构建的重要性。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质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JEL分类号** H11, F10

**作者简介** 彭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100836 电子邮箱: penglei2005@163.com。

2023年是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克服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内外压力风险增大等诸多困难，实现了经济企稳并回升向好。2024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得到巩固和增强，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多，动能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改善，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但2024年伊始，一些西方媒体、机构和政客大肆渲染中国经济各种利空，歪曲编造中国“债务危机论”“经济崩溃论”等负面新闻唱衰、做空中国经济。加之经济回升势头未达到广大群众的预期，社会上一些悲观、彷徨乃至怀疑的声音有所抬头。这种思想上迟疑摇摆，信心上灰心气短，行动上踟蹰不前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要积极采取必要措施扭转这一风气，统一思想、提振信心、积极行动。把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八对重要关系的基本观点向广大干部群众讲清楚、说明白，是摆在理论工作者、政策制定者、舆论宣传者面前的紧迫工作和任务。

## 一、“主义”与“方法”的关系

弄清中国经济运行内在逻辑，首先必须理解和掌握我们党领导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理直气壮地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的“主义”，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前进的方向和旗帜，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定海神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的“方法”，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了这个坚守，所谓“民营企业退场论”就会不攻自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西方式“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有制形式，国有企业稳定器和调节阀作用，

能够克服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总量和结构不平衡问题，这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经济运行的最大区别，也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底气的源泉。历史上，我们先后成功抵御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就是最好的例证，这要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当前，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具体体现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我们的“主义”和“方法”最新实践的完美结合，全面、系统、准确地回答了当下中国经济怎么看和怎么干的问题。早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论断，并给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解决方法。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补一降”五大任务。遗憾的是，一些民营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对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的判断和要求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错过了调整库存和杠杆的最佳时机。遇到新冠疫情不可抗力，险些造成重大风险。可以说，习近平经济思想早已把如何搞好中国经济的答案摆在我们面前。当前经济遭遇暂时困难，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坚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无论是理论工作者、政策制定者还是企业经营者都要加强学习，深刻理解内涵，不浮于文本表面，提振信心，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有关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贯彻实施好。

## 二、宏观形势与微观体感的关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3%，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从宏观数据来看，2023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2024 年 1—4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全国网上零售额 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3.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1%。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8.4%。1—4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1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分别为 9.7%、14.5%。1—4 月，货物进出口总额 1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6.9%，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9.2%。总体而言，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总体运行平稳，经济回升态势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和增强。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与广大微观企业和群众的体感出现了“温差”，必须要把个中原因跟干部群众说明白，要让干部群众认识到困难是暂时的，要坚定对中国经济前进方向的信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6%，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1.17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8.5%；商品房销售额 11.66 万亿元，同比下降 6.5%。2024 年 1—4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8%，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2.93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20.2%；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2.81 万亿元，同比下降 28.3%。房地产行业关联性较强，与建材、基建、家装、家电、房屋中介、金融服务等上下游产业密切联系，而上下游行业多属于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众多，且以民营企业居多。因此，2023 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快速收缩产生了“放大效应”，迅速传导到上下游各个领域，影响到广大民营企业及相关就业和收入。另外，疫情的“伤疤效应”显现出对经济的破坏力：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风险偏好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明显上升，更多的流动性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和增加储蓄，而不是投资和消费；民营企业因疫情不可抗力导致流动性紧张，修复资产负债表成为其优先选项，投资意愿不足。为应对当前困难局面，2024 年以来，中央果断密集出台多项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渐显现。首先，稳住房地产市场，暂停各类收缩性房地产政策，力争尽快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5 月 17 日，央行下发通知，取消全国层面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随着中央扎实推进保交房、消化存量商品房等重点工作，下调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放开房地产“限购”等利好政策实施，房地产市场有望企稳。其次，实施扩张性的

财政政策，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力度并减税降费，实现对企业居民投资消费的有效“替代”，弥补当前企业居民投资消费意愿的不足。中央决定从2024年起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2024年首先发行1万亿元。5月17日，首批3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启动发行，规模达400亿元，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实施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全社会共同投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21日，部分家电企业、汽车企业已公布的以旧换新补贴计划金额超过150亿元。最后，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利率政策为主线，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特别是稀释民营企业近年来综合融资成本，以缓解其资金压力。央行年初降准0.5个百分点，释放中长期流动性超过1万亿元，并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继续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2月引导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0.25个百分点，促进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宏观形势与微观体感之间的“温差”，一方面，反映企业和居民恢复和补充抗风险流动性需要较长时间，这一过程可能缓慢，要予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也间接表明当前宏观政策的红利向微观主体涓滴的效应不明显，政策发力点仍有待进一步精确定位。从宏观层面上看，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从2023年算起，争取用3年时间妥善处置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各类经济风险隐患，消除经济运行梗阻因素，畅通“双循环”体制机制，为下一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为此，各项稳增长财政货币政策既要集中力量支持办好一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中的大事要事，发挥其乘数效应；也要主动与企业 and 居民息息相关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民生政策等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涓滴效应。要紧紧围绕“夯实、巩固、畅通、提升”方针原则，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的各项改革任务，夯实在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价格改革等关键领域成果，并梳理各项关键性改革的梗阻因素，进一步畅通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

### 三、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的关系

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是不可逆的战略选择。但在对外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事情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sup>①</sup>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论述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sup>②</sup>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习近平，2013）。“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共中央宣传部，2023）。强调自力更生，是基于今后相当长时期我们面临复杂严峻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作出的判断。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去中国化”加速，纷纷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寻求“备份”。此外，受到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影响，特别是中美博弈白热化，美国利用“长臂管辖”胁迫西方高技术企业对我国实施制裁和封锁，目的是将我国排除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体系之外。可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全球贸易投资的“替代效应”远大于“创造效应”。自2022年底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表现出对政治立场一致贸易伙伴的偏好，“友岸外包”趋势更加明显。从双边贸易依存度来看，相较于2022年贸易额平均值，2023年第三季度俄罗斯对中国增加8.0%，美国对欧盟增加1.3%；相反地，俄罗斯对欧盟贸易依存度减少6.4%，美国对中国减少1.8%，韩国对中国减少1.4%，日本对中国减少1.2%。

2024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最终胜选，都不会改变美两党对华政策大方向，遏制中国崛起已成为两党共识。中美博弈呈现长期性、复杂性、颠覆性特征。当前，我国与美国“攻”“守”之势相持，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sup>②</sup>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积蓄力量，静观其变。正是基于此，我们更要坚定不移贯彻好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部署实施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通过内外贸一体化，着力建设区域乃至全球统一大市场。要把巩固和夯实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作为着力点，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竞争新优势，积极着眼布局未来产业，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要做好应对各类制裁及反制裁的场景设计和预案准备，确保极端条件下的粮食、能源、金融、重点产业供应链等绝对安全。

此外，当前对外开放还需进一步强调以“我”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朝着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方向探索前进，并采取渐进式开放路径努力将自身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全球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从最开始被动吸收借鉴到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华丽转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其不仅是要求与当今世界最前沿经贸规则相衔接，更是对我国主动设置经贸议题，引领全球经贸规则前进方向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比如，在数字贸易领域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易规则：数据传输的“负面清单”制度；“依托数字基础设施网络虚拟空间的数字关境”海关数字贸易特殊监管模式；数字内容服务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移动互联网支付标准等。还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下，积极研究探索新时代陆路贸易新规则，树立陆路贸易、运输国际规则的“中国标准”等。再比如，在“双碳”目标下，探索碳税、碳关税与绿色贸易相关规则等。经贸领域以“我”为主，主动设置议题既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从容应对全球复杂严峻政治经济局面的棋子和筹码，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 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体系中，“改革”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解除生产力束缚，促进生产力发展；二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

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改革是螺旋上升、循环反复的运动过程。从现实角度看，改革最核心的是利益的调整。如果罔顾这一事实，那么再理想和科学的改革举措都会成为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用改革的手段推动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注重平衡各方利益，调动各方积极主动性，改革的阻力才会最小，成本才会最低，推进才会顺畅。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意识到改革涉及利益调整，“改革哪有不触动现有职能、权限、利益的？需要触动的就要敢于触动，各方面都要服从大局。各部门各方面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跳出部门框框，做到相互支持、相互配合。”<sup>①</sup>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全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好经济工作，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落实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防止不切实际地定目标，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实事求是讲，中央和地方关系始终是一对矛盾关系。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措施对不同地区、不同省份意味着利益不同的让渡和调整。如何平衡改革和地方利益调整的关系，当前完善财税制度是最为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制度，以调节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1994年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和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保证了财政收入，加强了宏观调控，深化了改革，扩大了开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部署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

<sup>①</sup>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2页。



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从财政事权入手推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2019年，为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机制。经过几轮改革，财税制度不断完善，既维护了中央统一权威，又保障了地方积极活力。但近些年形势却发生显著变化。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6.63万亿元，同比下降10.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80万亿元，同比下降13.2%。2024年5月20日，财政部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1—4月，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22万亿元，同比下降9.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万亿元，同比下降10.4%。<sup>①</sup>与2021年同期收入2.14万亿元相比下降超过1万亿元。此外，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测算，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在2013年达到峰值，占比59.8%，随后呈逐年下降趋势。

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要求，土地出让金除了近70%用于征地补偿等成本性开支外，主要用于地方城市建设、农业农村发展、保障性民生等支出领域，是地方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地方经济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减少与房地产市场息息相关。党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最新表述，出现在2024年4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抓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sup>②</sup>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阶段已经成为过去时，依靠土地出让金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缺口的做法难以为继。我们应当注意到，此次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市场的表述，是放在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标题下，同时还表述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中央已经清晰认识到三者风险是“串联”互动的关系。随着房地产市场趋于理性和稳定，作为地方政府最重要预算外收入来源将大幅减少。以此为信用基础设立各类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经营将

<sup>①</sup> 参见财政部：“2024年4月财政收支情况”，[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405/t20240517\\_3935136.htm](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405/t20240517_3935136.htm)。

<sup>②</sup> 参见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8449.htm?type=5](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8449.htm?type=5)。

面临巨大挑战，更多“隐性”债务将“显性”化，风险自然而然会外溢至政府和金融机构。因此，当前在做好保交房工作，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尽快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基础上，要持续深化税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加快构建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收体系。

##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伦理的关系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sup>①</sup>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sup>②</sup> 此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不断深化，对市场作用的认识不断升级。2013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提出七个关键领域的改革举措，非常清晰地表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 and 路径，强调推进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是我们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最终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道路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物质和意识（精神）的辩证统一，即物质的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sup>②</sup> 参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16页。

决定性作用和意识（精神）的反作用。我们党长期以来注重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sup>①</sup> 2006年3月，我们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非凡成就。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是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实现形式；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精神文明的具体表现，它既与精神文明相联系，侧重又有所不同。从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算起，2024年是第40个年头。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什么遗憾和缺失，那就是我们长期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架构等“物质”方面的建设，而对与之相匹配的精神内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塑造强调不足。如果将资本主义伦理“资本至上”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出现各类“不适症”，如欺诈诓骗、假冒劣质、资本无序等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之适配，必须加快构建以“人民至上”为核心要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体系。必须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储备和实践认识是不充分的，必须加快补足短板。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2023）。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使感性认识深化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从而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sup>①</sup>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我们党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重视不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国具体实际的精神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进取，善于吸收融合新的认知，通过实践形成新的理性认识；而落后传统文化因循守旧，成为阻碍新认知的“卫道士”。真理离不开实践土壤，而实践土壤具有民族特有的文化属性。“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sup>②</sup>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构建了中国具体实际的精神内核，在矛盾运动过程中持续与落后传统文化进行斗争，推动了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建构进程。因此，要发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的主观能动性，必须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递进和伴生的辩证关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并剔除糟粕。从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形成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古代哲学思想，最终都具象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系统性价值理念和是非标准，刻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共同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特有的民族性格和国民品质。如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团结协作、守望相助的集体意识，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智慧，多元一统、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等，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赓续不断、繁衍不息的深层文化原因的精神内核。“人们的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费孝通，1998）。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应用在国家治理和个人行为规范上，则构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最深刻和丰富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着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伦理体系的努力方向。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7页。

<sup>②</sup>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 六、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关系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超 80%，是我国经济的“压舱石”。2024 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在工业 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7 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这 37 个行业中，传统产业占比 75% 以上。可以说，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已成为推动经济恢复向好的一个重要引擎。对于服务业，绝大多数服务行业均为传统行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5.1%，对增长贡献率达到 63.0%，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3 个百分点。2013—2021 年，服务业就业人员累计增加 8375 万人，年均增长 3.0%，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 931 万人。2021 年，服务业就业人员 35868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达到 48.0%。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传统行业，构成了我国经济基本面，是维持经济内循环健康、稳定、顺畅的根本保证。一窝蜂搞“高精尖”，轻视和忽略传统产业的想法要不得，也不切实际。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新质生产力理论来指导高质量发展，同时强调传统产业利用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2024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联组会时，强调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坚持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给出明确界定，“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

力。”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sup>①</sup>我们要充分领会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当前，我们正处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拓展期，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催生出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同时也创造出新的供给。这里需要强调，要依靠“新的供给”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引致有效需求。因此，当前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催生“新的供给”，即通过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服务、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交付方式、新的推介方案等。2024年年初，哈尔滨文旅部门成功将冰雪旅游与抖音等自媒体之间的流量实现互动，形成旅游业与自媒体共赢发展的局面，是创造传统行业“新的供给”的成功案例。在以传统服务行业为主的商务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理应积极鼓励商务领域新的产品服务、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新的交付方式创新和推广。对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出现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交付等创新活动和案例，要研究推广和完善的政策体系，形成良性循环局面。

## 七、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3个、1.5个、-0.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82.5%、28.9%、-11.4%。据此，有人质疑外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直至平衡是长期趋势。按照拉动率及贡献率计算方法，今后该数据很难有大的起色，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知并以平常心待之。

根据统计局和商务部数据，2023年货物贸易顺差57884亿元，较上年顺差仅缩小746亿元；而服务贸易逆差12041.1亿元，较上年逆差急剧扩大9284.1亿元。2023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65754.3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出口26856.6亿元，同比下降5.8%；进口38897.7亿元，同比增长24.4%。从数据可以看出，服务贸易巨大逆差拖累了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

<sup>①</sup> 参见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究其原因，主要是新冠疫情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恢复尚需时日。但这也暴露出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总体比较优势的建立进展缓慢，需要引起重视。就货物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依然显著，但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这与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致的。那么外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畅通经济循环，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提升供给质量，是新时代外需发挥作用的主攻方向。鼓励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支持企业输出中间产品和高价值生产性服务，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为国际特别是国内消费者生产质优价廉的商品。鼓励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主动改造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流向，扩大对其最终消费产品需求，增强与我国经济“黏性”。充分利用我国大数据要素的禀赋优势，对传统西方主要贸易伙伴的市场偏好准确定位，推出各种“爆款产品”，提升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稳步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转型等。要大力培育各类外贸服务代理中介机构和平台企业，把外贸产品经营资质与拥有进出口权相分离，鼓励外贸代理，打破专业外贸知识壁垒，通过提供价格专业的专业服务，迅速把任何企业个人发现的“商机”转化为外贸实绩。要密切跟踪产业转移情况，引导制造业有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努力构建以中国为“雁头”的国际分工格局，以中国企业为“龙头”的国际供应链体系。鼓励企业通过贸易、投资、产业联盟等方式整合原材料供应、加工装配、中间品生产、物流仓储运输、设计研发等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完善全球供应链体系布局。

要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现代先进制造业无论是产品制造过程，还是最后产成品，体现的服务需求无处不在，先进制造企业更像是各种生产性服务、中间产品供应商的系统整合者。因此，天然割裂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不仅会削弱先进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而且也不利于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竞争优势，这也是前面提到的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提升缓慢的主要原因。2024年3月22日，商务部发布《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2024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统一列出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当地存在、金融服务跨境贸易等方面对境外服务提供者以跨境方式(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模式等)提供服务的特别管理措施,分别适用于全国范围和自贸试验区范围,标志着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我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主要有3张管理清单,分别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共31条)、《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共27条)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自由贸易港负面清单共27条)。这3张清单已经基本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大多数条款均是针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服务的禁止性规定。下一步应考虑以3张负面清单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缩减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服务的禁止性条款。

## 八、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已经10多年,随着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平衡面临较大承压,对资本和金融账户进一步开放提出新的要求。为确保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安全性,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资本金融项目开放路径是一项稳妥的选择。根据“不可能三角”(The Impossible Trinity)理论,可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以保障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相对自由的资本流动。

突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联动效应,打造浦东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提升上海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加快浦东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储备资产供应能力,丰富完善各类金融及其衍生产品,如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发行、企业债、股票国际板、境外(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企业发行票据等。加快与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等海外离岸人民币市场互联互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风险防控和监管体



系建设等克服境外离岸市场的局限性，保障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的安全性。

要不断创新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积极拓展跨境人民币使用范围，鼓励离岸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务人民币使用，推动人民币境外借款、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推进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负债的本币化，促进人民币从官方储备资产向跨国公司重要资产的渗透，进入跨国公司资产负债表。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银行金融机构参与的清算网络。探索建立与数字贸易相匹配的移动互联网支付系统的规则。鼓励移动互联网支付企业在东盟国家创立企业和建立合资企业，采用国内支付规则 and 标准，并积极研究将移动互联网支付企业纳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 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 年，[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901250.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901250.htm)。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2 年。

（责任编辑：老 刀）

## 相关文献介绍

裴长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



裴长洪研究员的抗鼎力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自主经济学科体系作出三个重要趋势性变化判断：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和应用学科中的中国化、时代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二是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改造和完善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三是挖掘和贯通中国经济学思想史中的精华不断赋予经济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趋势不可逆转。

读懂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味着读者能够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论，从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经济学逻辑三统一原则看待、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运行基本规律和特色方法。也就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特别是裴长洪研究员对中国经济学界振聋发聩的呼吁，要坚持经济学自我革命，对以往学术思想反思清理，纠正洋教条和洋八股的片面性，要把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与方法的有益成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基础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本经济学本土方法论开篇著作，认真研读一定受益匪浅。